

朗读与呐喊

□莫言

今年二月初,在故乡的大街上,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“矮脚虎”方快相遇。其实他的腿并不短,但不知为啥得了这样一个外号。他满头白发,脸膛通红,说起话来有嗡嗡的回音。他自小身体健壮,力气超出同龄孩子许多。班里的男生,几乎都挨过他的揍。我也挨过他的揍,原因好像是他向我借五分钱而我没钱借给他。当我哭着去向班主任告状时,那位很奇葩的老师说:活该!他怎么不来打我呢?

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。我说“矮脚虎”啊,我都六十多岁了,你就别叫乳名了吧?他说,你想让我叫你什么?叫你莫言?呸!

与方快分别后,我想起了好多与他有关的事,比如这件我马上要写的与朗读有关的事。

我们那时上语文新课,总是先由老师朗读一遍——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我们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。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,在当时的小学老师里算是高学历,那时他的年龄也不过二十出头。我们那地方的人对说普通话的人有两种态度:如果你是外乡人,或是县里的干部,你讲普通话,大家都很钦佩。如果你是本地人,出去上了几天学或是当了几年兵,回来就说普通话,那就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。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,我们对用普通话讲课的语文老师也是从心里鄙视的。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,我们的老师还能坚持用普通话讲课,现在回想起来,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——老师用普通话朗读一遍之后,便让我们跟着他读——我们当然不用普通话——先是一句一句地读,然后是一段一段地读,最后是让我们齐声朗读。我们齐声朗读时,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,辨别着我们发出的声音里,是否有对课文的故意歪曲。

有一天中午,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,用瓦罐提到教室里,放在脚下。那天下午要上新课,课文题目是《青蛙》。老师带领我们朗读:

“每到黄昏,池塘边上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,然后用颤音发出一声短鸣,接着满塘的蛙便跟着唱起来。呱!呱!呱!……”

我们从来没像这次朗读这样兴致勃勃,这样卖力,这样愉快,这样充满期待。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着方快,他的脸膛红扑扑的,脸上洋溢着喜气。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,但这次成了领读者。他的嗓音洪亮,富有韵味,而且,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,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。这时候,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尖罐,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。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,那些青蛙在教室里蹦跳着。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,我们听到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:

“……青蛙还受到科学家的另眼看待,因为许多科学试验都少不了它们……青蛙,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……”

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,但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,老师蜡黄的脸渐渐变得红润起来。方快停止了朗读,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着。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,连声说:“好好好!太好了!”

此后不久,方快便当了我们的学习委员,之后又当了班长,他成了好学生,成了老师的骄傲,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,他参加全县小学生朗读比赛获得了第三名,一时声名赫赫,在他的面前,似乎铺开了一条撒满花瓣的道路,如果不是后来他的父亲被查出“历史问题”,那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。当然,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,他家的豆腐,质量很好,供不应求。

我应该是方快引发的朗读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又一个典型。我们朗读,我们背诵,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,我们班的同学们一大半都达到了这水平,与此同时,朗读也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大大提高,因为,我们在朗读中获得了语感。

在村里混到十八岁,托叔叔的面子我到离家八里的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,这是个令农村年轻人向往的好事儿。棉花加工厂晚上开会,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安排几个人发言,其中有我。稿子都是从报纸上整篇儿抄下来的,所谓发言,也就是念稿,谁的声音大,谁念得流利,谁念得音节铿锵,大家就给谁鼓掌。我是赢得掌声较多的,这得益于在学校时的朗读训练。在我赢得赞誉时,我想,如果“矮脚虎”在这里,出彩的一定是他。

后来当了兵,在新兵连训练时,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,于是他就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。调到军校后,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,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。讲哲学、政治经济学,使用的都是大学教材,我哪里懂这些?但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,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。方快做豆腐是现做现卖,我讲课是现学现讲,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感谢领导的信任,也感慨自己的无知无畏。

那年寒假,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。为了使开学后的课讲得从容些,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,讲稿写好了,就一遍遍地读,先是小声读,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。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的普通话,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“高普”(高密普通话)。直到现在我还是一口“高普”,没有稿子闲谈时,还稍微“普通”一点,一念稿子就找不着调,为什么这样呢?我也不知道。

(摘自《文汇报》,有删节)



这么小就进了博物馆

□舒乙

这次,在法国,最让我吃惊和感动的是,小小孩成了各类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古迹里的主角。在那些地方,遍地都是孩子,成群结队,由老师领着。多数情况下,孩子们进去便席地而坐,听讲,宛如上课。一呆就是大半天,还在那里吃饭。

所谓小小孩,是指幼儿园里的孩子。当然,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,在国外,更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常客,这不稀奇。稀奇的是幼儿园的孩子要“长”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。这一点,大出我的意料。

此前,我在圣彼得堡的“俄罗斯博物馆”偶然见到过一组幼儿园的孩子去赏画,还站在一旁偷听过年迈的解说员怎么给孩子们讲解。此次,在巴黎,在里昂,在普罗旺斯,在所到的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古迹里,孩子们成了那里的主角,占了参观者的大多数。孩子们去博物馆和美术馆竟然普及到这种程度,着实让我吃惊,更是感慨万分。

我长期在文学馆工作,又曾担任过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副理事长,知道中国孩子参观博物馆是怎么回事。我知道,在国外和在国内,孩子们去博物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,由观念到做法,都截然不同,区别极大。中国孩子们由于长期封闭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,偶然去一次博物馆,就全然是“得解放”,有如春游或者秋游。进门之后,狂奔五分钟,转一圈,算是参观了,不听讲解,又叫又跳,快活得不得了,然后,围坐下来,开始吃东西,喝饮料,做游戏……最后,坐上大轿车,打道回府了事。即便是这样的“参观”,一般每学期只安排一次,多了怕出事,被限定不宜多办。

我去了一座离巴黎45分钟路程的皇家教堂和修道院遗址。它叫“华幽梦”,译名很漂亮,现在由一家民间的艺术基金会管理,免费对孩子们开放。进去后发现有成队的小孩子早已进来参观和做功课了。那天,几乎没有成人去参观,全院都是孩子们的天下。由草坪到花园,到每一间展室,包括在图书馆里,都有孩子们的身影。这个景象,在中国的古迹里和博物馆里是

绝对遇不见的。

这家古迹的管理者还专门为儿童设计了许多游戏项目。譬如说,每个孩子胸前都挂着一块小方牌子,上面有不同的图案。闹了半天,是博物馆发给他们的作业,让孩子们在博物馆地上去找,地上铺着不同图案的磁砖,都是古物,找到和自己胸前图案一样的磁砖就有奖。在一个露天的大教堂废墟遗址上,孩子们听完讲解,纷纷爬到残留下来的大石头柱基上,蹦上蹦下,那可都是八百年前的古物啊。

看了这些,我恍然大悟,有四条结论:一、让孩子们从小就“长”在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古迹名胜里,把这些地方当成他们一生的最佳去处。长大了,一辈子要去无数次,反复地去,自己去,还带自己的孩子去;二、从小就知道要传承历史,要重视文化,对文物、对美术作品、对历史文献、对古典建筑有一种敬畏感和尊敬感;三、从幼儿园到大学,通通把去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名胜古迹当成经常性的必修课,真的是在那里上课,让有专业知识的白发苍苍的专家授课,年纪大的要记笔记,填写知识答卷,回去要交参观心得的作文,甚至提供专题报告;四、博物馆、美术馆和名胜古迹把教育儿童当成自己第一要务,因为这是利在千秋的大事,难怪在国外,根本看不到博物馆挂着某某学校教育基地的牌子,因为在那里挂这样的牌子完全是多此一举,它们的基本职责本来就是教育儿童。

回过头来说,在我参观途中,发现有一群穿着非常正式的官员围着一名女士,正在谈论什么。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,她是法国现任的教育部长,正在考察该处工作。由此可见,博物馆也好,美术馆也好,古迹名胜也好,都和教育密不可分。博物馆压根儿就应该把目光盯住儿童,目的是由小造就一代又一代有教养的文明人。

当天,我们想在修道院里吃饭,知道那儿有公众餐厅,进去一问,才知道不行,原因是餐厅的全部座位都预留给了来活动的孩子。

儿童,由头到尾,在各方面,都是第一位的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,有删节)

科举的认真

□温儒敏

小时候读《儒林外史》,对范进中举后发疯的描写有特别深的印象,于是对封建时代开科取士的制度也就感到厌恶。在很长时间里,我对科举制的了解也只限于类似《儒林外史》的文学性批判。最近到上海,参观了嘉定的科举博物馆,发现原来自己对科举的印象毕竟太肤浅简单了,科举制度的确有扼杀人性的残酷一面,但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特殊作用,也并非一个批评可以了断。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的事,此处先不用去管,反正一般人参观了嘉定的科举博物馆,很自然地会感到科举制也有公平严格的一面。

展览中用一部分实物重现了科场考试的情景:为防止作弊,每位考生都被分隔在一间不足2平方米的小板屋内,试卷做完后由专人统一抄写,再呈主考官批阅,以防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;夹带作弊的也有,可是一经发现,处分特严,所以敢以身试法的的确很罕见。鲁迅的祖父就曾因“函托考官贿嘱关节”,也就是走后门行贿,而被革职入狱。甚至惊动了光绪皇帝,成为轰动一时的“钦案”。可见科举考试的执法还是很严的。

参观完毕,走出博物馆,听到一位游人在感慨:“看来咱们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认真的时候。”这感慨让人心情沉重。

联想当今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,作弊之风似乎越刮越凶。甚至连博士学位论文答辩,有不少学校也是马马虎虎走过场,有些导师为了让学生顺利过关,就只请好说话的熟人作评议,一些专家碍于情面,也是把评议和答辩作为“友情出演”。结果凡是评议大都说说好话,不合格的反正也手下留情放他一马,极少有不被通过的。

我“文革”结束后上了北大中文系头一批研究生,当时全系19人,答辩时有4人未能通过。有的导师认为学生论文不合格,又难以再修改,就自己先投了反对票。像这样认真,放在当今,怕是会被人笑话为不通时务的。我认识一位教授,请他参加研究生答辩,他就要实话实说,有真刀真枪的批评,结果这些年找他评议的就越来越少了。

最近,北大中文系开始实施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,力图在学术制度上与国际著名大学接轨。此举的推出,让学生做论文有必要的压力,又有学术的尊严感,有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整体水平。前文提到那位游客所感慨的“认真”,现在竟如此缺少,是否应当反思一下,从古人那里获取一些精神资源呢?

(摘自《燕园困学记》)